

## 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运动

○ 刘甜甜

(青岛大学 公共外语教育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宗教改革揭开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确立了《圣经》的权威地位,反对天主教会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由于主流改革局限在宗教范畴之内,止步在世俗权力面前,未能彻底贯彻宗教改革的宗旨,激进改革应运而生。在宗教层面,激进改革要求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不受国家政权控制、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在社会层面,激进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政治、经济压迫,要求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平等、更符合基督教理想的社会。激进改革代表了以农民、工匠为主体的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是对宗教改革的继承和突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激进改革运动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08.022

500 年前的 1517 年,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大地上兴起,沉重地打击了天主教会和王公贵族所代表的封建统治,揭开了欧洲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宗教改革过程中,代表下层民众利益和要求的激进改革十分引人注目。激进改革秉承宗教改革的宗旨,要求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不受国家政权控制、由信徒组成的教会;同时又突破宗教改革的边界,要求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更公正、更平等、更符合基督教理想的社会。对于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改革,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似乎略显不足。本文对其兴起背景、历史发展和历史地位做一简要论述,以纪念伟大的宗教改革运动 500 周年。

### 一、欧洲宗教改革的兴起和宗旨

中世纪的欧洲是天主教的一统天下。在宗教方面,天主教实行以教皇为最

高权威的教阶制,依照这一等级制度,管理欧洲天主教的整个组织体系,各级神职人员通过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忏悔礼、终敷礼、圣职礼和婚礼等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天主教神职人员还垄断着《圣经》的解释权,普通民众只有通过他们的宣讲来接受《圣经》知识。这样,通过教阶制度和由神职人员管理的教会,天主教控制着所有人的宗教生活。

到中世纪晚期,天主教会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要反对已经腐朽的封建制度,天主教会首当其冲。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把整个封建的欧洲(尽管有各种内部战争)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了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它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自己还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sup>[1]</sup>

实际上,在中世纪期间,始终存在着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反抗和要求改革的呼声。中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成熟,在资本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和人文主义三大洪流的推动下,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正式揭开了序幕。

宗教改革的揭幕人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是一名天主教教士,1512年获神学博士学位,进入维滕贝格大学神学院任教,教授《圣经》。路德在深入研究《圣经》之后,开始怀疑天主教会“善功称义”的教义,逐渐走上了与天主教决裂的道路。

1517年,罗马教皇以维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在德国兜售“赎罪券”,宣称人们只要购买“赎罪券”,教会就可以帮助他们免去罪罚。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大门上张贴出《关于赎罪券的力量与效验的争辩》(简称《九十五条论纲》),对教皇兜售“赎罪券”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路德认为教皇没有免除罪罚的权力,赎罪券也没有赦罪免罚的功用。尽管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并没有公开反对教皇,也没有要求改革天主教会,但是,它对教皇和教廷权威形成了直接挑战,促使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情绪迅速发酵,最终成为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导火线。此后,路德先后于1518年和1519年与教皇代表进行辩论,并连续发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基督教徒的自由》等多篇文章,将他的改教主张逐步展开,从而确立了宗教改革领袖的地位。

路德神学的核心是“因信称义”。路德认为人只有依靠上帝的义,才能获得拯救。要有信靠上帝的应许的信心,才会在上帝面前称为义。在当时情况下,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肯定了“凭借恩典因信称义”,就挑战了天主教教义中宣扬善功是获得救恩途径的信条,也质疑了当时风行的赦罪券的功用。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的权威受到了实质性的打击,其在欧洲人民的信仰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被严重削弱。<sup>[2]</sup>

路德神学在贬抑教廷和教会的权威的同时,强调《圣经》的权威地位。在中

世纪后期,天主教会认为《圣经》和教会传统是双重源头的上帝启示,两者并行不悖,更不会相互冲突。路德认为,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确立《圣经》正典的根据,教父遗训和教会传统都是为《圣经》作见证。<sup>[3]</sup>路德强调《圣经》权威,同时认为每个信仰基督的信徒都有权解释《圣经》:

“他们声称只有教宗才可以解释《圣经》,这是蛮横想象出来的无稽之谈。……罗马派的人必须承认,在我们中间存在一些具有基督的真正的信心、精神、理解、话语与心思的基督徒。那么,为何我们要抗拒好基督徒的话语和理解,来跟随那既没有信心又没有圣灵的教宗呢?”<sup>[4]</sup>

为使普通人能够阅读《圣经》,路德开始将《圣经》翻译成德文。1522年,他翻译的《新约》面世,及时地满足了宗教改革兴起后普通信徒了解《圣经》知识的要求。

可以看到,路德的“因信称义”和强调《圣经》权威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天主教会和教士的宗教垄断权力。路德同时还提出了“信徒皆祭司”的思想。路德说:

“所有基督徒都是真正的属灵阶级,除了在职分之外,他们彼此是没有分别的。……在接受洗礼之后,任何信徒都可以自称为神甫、主教和教宗,虽然那并不是说任何人都能够承担这些职分。”<sup>[5]</sup>

作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路德自然受到罗马教廷和教会的仇视。1521年4月,路德被罗马教廷革除了教籍。然而,路德宣传的教义和改革主张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不可阻挡。同时,由于改革顺应了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潮流,迎合了许多地方诸侯和城市政权获取更多权力的要求,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给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所需要的政治力量。这样,一些地方开始按路德的主张改革教会,产生了独立于罗马教会的、受地方诸侯和政府控制的改革教会。这些改革教会在地方政权的支持下,与罗马教廷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基督教新教教会。

应该说,在宗教改革初期,地方政权与改革教会之间出现的这种状况,与路德关于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思想存在着某种联系。路德这方面的思想被称之为“两个国度”或“两种政权”的思想:

“上帝在世人中间设立了两种政权:一是属灵政权,这政权不佩带任何武器,只具有神的话语,借此栽培良善和正义,使义人获得永生。……二是属地政权,这政权借着法制的力量,使那些不愿寻求良善和正义去获得永生的人可以在世人眼中受到管辖而有良善和正义的表现。”<sup>[6]</sup>

路德认为,两个国度或两种政权尽管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但并不意味着国家和教会应该分离,因为它们都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设立的。所以,路德肯定世俗权威的合法性,认为基督徒应该服从世俗政府的统治。《圣经·罗马书》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这为路德的这一理论提供了依据,也成

为路德与支持改革的地方诸侯合作的基础。

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得到广泛的响应,很快就蔓延到欧洲许多地区和城市。包括贵族、教士、城市市民、手工业者和农民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都参与到宗教改革运动之中,使这一运动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不过,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改革思想和实践,遵循路德改革的基本方向、在地方诸侯或城市政权支持下进行的改革仍然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主流。

## 二、激进改革运动的发展历程

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涌现出来的多元化改革思想和实践中,路德所代表的主流宗教改革被称为温和改革,因为它在宗教改革方面未能将改革原则贯彻到底,在政治上依靠诸侯权贵进行改革,更为重要的是它始终没有真正涉及社会改革。与之相比较,几乎从宗教改革运动一兴起,就出现了一种趋向,主张更彻底、更深入地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更朴素、更平民化、更遵循使徒时代原始教会原则的基督教会;同时要求将改革延伸到宗教之外,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建立更平等、更公正、更符合基督教精神和原则的社会。这一改革趋向,相对于路德代表的温和改革,一般称之为激进改革。

宗教改革运动产生的激进改革趋向,首先就在宗教改革最初兴起的维滕贝格和路德改革阵营中表现出来,其代表人物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

卡尔施塔特是维滕贝格城的副主教,与路德是同事。他赞同路德的教义主张,参与了路德与罗马教皇代表的神学辩论,成为路德改革最为有力的支持者。不过,随着改革运动的深入,他和路德在改革策略、改革时机以及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开始出现分歧。路德避居瓦特堡以后,卡尔施塔特成为维滕贝格改革的主要领导人,他试图将改革主张在教会实践层面付诸实施,并提出某些社会改革主张,从而使维滕贝格改革具有了一定程度的激进色彩。

卡尔施塔特的教会实践改革首先从圣礼开始。在天主教体系中,圣礼是一系列十分复杂的仪礼,它通过严格规定的繁文缛节,阻断平信徒和神的直接沟通,从而保证作为中介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对教会和信徒的宗教控制。因此,要打破平信徒和神职人员之间的壁垒,让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平等地分享祭司的身份和教会的权利,就必须改革天主教会的传统圣礼,主要是弥撒礼。从1521年夏天开始,卡尔施塔特就宣传要对弥撒礼进行改革,得到信徒的热烈响应,而统治这一地区的领主萨克森选侯下令仍然按传统方式进行弥撒礼。

为了推进改革,卡尔施塔特决定违抗选侯命令,顺从民意,宣布将以新方式做弥撒。1521年12月24日,卡尔施塔特以新方式主持了圣诞弥撒。卡尔施塔特身着普通服装,部分使用拉丁语部分使用德语诵读弥撒文,删掉了把弥撒看作献祭的所有段落。他以饼杯同领的方式向信徒分发圣餐,并允许平信徒用手取圣饼。这次圣诞弥撒,被称为历史上第一次新教圣餐礼。在这之后,他又在元旦日等场合数次主持了这种圣餐礼。

对于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改革来说,卡尔施塔特在维滕贝格进行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将改革的神学主张付诸教会实践;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它是在没有得到地方统治者的允许,甚至是在违反地方统治者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而强烈冲击了世俗权威在宗教问题上的影响力,民众的不满和改革要求也因之得以较为自由地释放出来。1522年1月24日,维滕贝格市政会发布了第一个改革令,批准了大部分改革实践。同时,在卡尔施塔特的力促下,市政会还采取了某些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废除娼妓、乞丐,为穷人和失业者提供救助和教育,建立公共基金等,试图改良社会,建立基督教的公义社会。

然而,未得到领主许可的维滕贝格改革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一些王公贵族的压力下,萨克森选侯于2月13日下令,推翻了卡尔施塔特的大多数改革措施。3月6日,路德从瓦特堡返回维滕贝格,指责卡尔施塔特的改革过于激进,恢复了传统的弥撒礼。

从教义方面来看,卡尔施塔特的改革与路德的改革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在路德看来,重要的是世俗权力的态度。路德发表文章,宣布只有世俗权力可以强力进行必要的改革,因为他们具有惩治邪恶的责任;而普通人应该服从世俗权力,通过“教导、布道、说话和写作”来宣传改革,而不是强行进行改革。<sup>[7]</sup>路德的思想表现出了主流改革和激进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依靠世俗权力进行改革还是通过民众斗争进行改革。这一区别在另一位主张改革的教士的思想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名教士就是被恩格斯称为“平民革命家”的闵采尔(Thomas Müntzer)。

闵采尔是一名天主教教士,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他追随路德,成为路德改革主张的积极支持者。1520年,经路德推荐,他去到位于萨克森南部的矿区城市茨维考担任牧师。在这里,他与矿工、农民等下层民众广泛接触,思想开始偏离路德的改革道路,逐渐走向激进改革的方向。

与路德强调《圣经》权威地位不同,闵采尔强调圣灵的作用。在他看来,《圣经》是死的文字,是外在的上帝之言;而圣灵则是内在的上帝之言,是上帝的活的声音,是上帝直接说给人的启示,“上帝用他的手指,在人的心上写下他不可改变的意志和他永恒的智慧,而不是用墨水书写在草纸或羊皮纸上。他在人的心上写下的东西,任何人都能阅读,只要他的心已经向它打开。”<sup>[8]</sup>可以看出,在闵采尔那里,上帝的启示并不限于《圣经》的文字,而且来源于人人可以感受到的圣灵,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圣灵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这样,闵采尔就进一步否定了教士是上帝和人之间中介的天主教教义,同时把自己和强调《圣经》权威的路德区别开来。因此,他在《布拉格宣言》的签名处这样写道:“闵采尔不想向沉默的上帝祈祷,而要向说话的上帝祈祷。”<sup>[9]</sup>

推动闵采尔思想进一步发展、最终提出反抗世俗权力主张的,是他在萨克森的矿区小镇阿尔施泰特的改革实践。在这里,他对教会礼拜仪式进行改革,吸引到众多矿区民众的支持。1524年春天,一部分信徒闯入阿尔施泰特附近的一座

教堂，毁坏了圣母玛丽亚的圣像，并放火焚烧了教堂。这一事件引起了统治贵族的关注，闵采尔的改革受到了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闵采尔开始产生出反抗世俗权威的思想。闵采尔告诫王公贵族，普通人有权力反抗违背上帝意志的统治者，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的刀剑，“刀剑也是毁灭作恶者的必需手段。……使用刀剑的正确方式是由王公们来使用，但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刀剑就会从他们手中取走。”<sup>[10]</sup>

王公贵族们并没有接受闵采尔的警告，反而要求他停止改革活动。闵采尔被迫离开阿尔施泰特，在德国南部流亡。在这之后，闵采尔与路德代表的主流改革公开决裂，彻底放弃了依靠世俗权威进行改革的努力，开始走上通过社会行动、依靠普通民众实现改革理想的激进道路。在流亡期间，闵采尔发表了直接抨击路德依靠世俗政权进行改革的文章，文章结尾处是他那句铿锵有力的名言：“人民将得到自由，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人。”<sup>[11]</sup>

闵采尔所说的人民，指的是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处在被统治地位的普通平民。闵采尔认识到，宗教改革的目标只有通过普通平民的改革才能完成，而普通平民也将在宗教改革中得到解放。如果说，宗教改革开启了变革的时代，让普通的平民看到了变革的方向，希望建立一个上帝的正义之下的平等社会；那么，由教士和学者领导进行的改革因为局限于宗教范畴之内，缺乏社会改革的内容，又让这些普通人大失所望。在社会不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以农民和城市市民为主体的德国普通平民终于揭竿而起，发起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改革，也就是普通平民的改革。这一改革首先通过德国农民战争表现出来。

德国农民战争爆发于1524年6月，由在不同地区发生的、相互关系松散的一系列农民起义组成，1525年6月遭到镇压。在战争期间，农民军提出《十二条款》《海尔布琅纲领》等文件，具体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既包括调整什一税、降低地租、归还林地等经济改革主张，也包括废除农奴制、人人平等、平民参与司法、普通信徒参与教会管理等社会改革主张。

《十二条款》宣称：“我们将完全按照基督的教导生活和行事，我们将通过基督的教导向我们的主祈祷。因为只有他自己，别的任何人都不能，给予我们正义。”<sup>[12]</sup>另一方面，德国农民战争也以其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所造成的巨大震动，给予欧洲宗教改革的发展以极其重要的影响。德国农民战争之后，路德代表的主流改革更加坚定地依靠诸侯和地方世俗权威推进改革，以防止平民暴力影响其改革目标的实现。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激进改革进一步和主流改革分道扬镳，独特性也愈益鲜明。

德国农民战争之后的激进改革运动的主体，是再洗礼派所进行的改革活动。再洗礼派是在宗教改革精神指引下产生的一个基督教派，它以《圣经》为圭臬，希望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起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因此，他们反对婴儿洗礼，要求那些通过聆听上帝之道而悔罪重生，并因而具有真正信仰的成人再次进行洗礼。因此，他们被称为再洗礼派。

最早的再洗礼教会于1525年1月在瑞士苏黎世产生,此后,随着再洗礼教义的传播和再洗礼教会在各地的建立,再洗礼派的改革运动在包括德国、奥地利、荷兰等国在内的欧洲广大地区展开。再洗礼运动是一个多源多流的运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各种派别众多,教义繁杂不同,再洗礼运动也因此呈现出多种色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最早的再洗礼派瑞士兄弟会,在摩拉维亚实行以财产共有、集体生活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实践的胡特尔兄弟会,在德国明斯特城通过武装斗争建立地上天国的明斯特再洗礼派和荷兰的门诺会。

归结起来,再洗礼派改革的目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主张把宗教改革的原则贯彻到底,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一个由信徒组成的、过圣洁生活的、追随基督的教会;(二)在政教关系上,要求打破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一的传统格局,主张教会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三)要求在宗教改革的同时进行社会改革,建立一个立足于基督教正义基础上的更公正、更平等的理想社会。

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会,一方面通过给婴儿洗礼,把社会所有成员纳入教会之中,是一个全民教会;一方面实行政教合一,国家政权和宗教神权统为一体,是一个国家教会。宗教改革兴起后,路德等改革领袖在地方政权支持下所建立的改革教会,为了保持教会和社会的统一关系,维持既存的社会秩序,保留了婴儿洗礼。从这方面来看,改革教会和天主教会相同,都属于国家教会,世俗权力掌握着教会的控制权和裁决权。可以看出,再洗礼派的改革主张完全否定和破坏了国家和教会一体化的存在基础和统治基础,必然会造成政教一体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因而被统治者视为宗教上的异端,政治上的叛乱,在欧洲各地遭到残酷的迫害。

纵观宗教改革时期激进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发展的大致脉络:从卡尔斯塔特、闵采尔等来自改革阵营的神职人员的教义宣传,发展到普通民众参加的改革实践;从单纯的宗教改革范畴内的改革,发展到社会领域的改革;从维持在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允许范围之内,发展到破坏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会的统治基础,激进改革运动呈现出丰富多彩而又曲折激荡的发展变化,为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 三、激进改革在宗教改革中的地位

激进改革运动兴起于宗教改革的大潮,可以说是宗教改革的产儿。一方面,宗教改革破除了天主教会的权威,从而打破了中世纪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神学桎梏,使长期受到天主教会压制的思想有了破茧而出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破除天主教会权威的同时,宗教改革提出了“唯独《圣经》”的原则,使得被解放了的思想找到了新的权威和归依,而宗教改革倡行的《圣经》本土化,又使得普通民众有条件直接阅读《圣经》,从而可以离开教士,自己到《圣经》中去寻求教义真理。如恩格斯在其著作《德国农民战争》中所说:“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

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sup>[13]</sup>

激进改革运动的领袖最初几乎都是宗教改革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通过宗教改革而走上了激进改革的道路。卡尔施塔特和闵采尔都是路德改革的支持者和积极参加者,再洗礼运动的早期领导者格里贝尔(Conrad Grebel)、曼兹(Felix Mantz)都曾是瑞士宗教改革领袖茨温利(Ulrich Zwingli)的忠实信徒,积极参与了茨温利与天主教会的斗争。再洗礼运动史上最重要的神学家胡伯迈尔(Balthasar Hubmaier),在改革之初是茨温利的亲密战友,参加了宗教改革史上著名的第二次苏黎世辩论,有力地支持了瑞士的宗教改革。其他再洗礼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的思想经过宗教改革的洗礼,在与天主教会的斗争中发展,在对《圣经》的研习、对基督教教义的不断探求中深入,最终转向了激进宗教改革的方向。

在宗教改革的世纪大潮中产生的激进改革运动,同样继承着宗教改革的宗旨,希望通过对天主教会弊端的改革,建立起符合《圣经》要求的真正的基督徒的教会。就这一根本宗旨来说,激进改革运动和宗教改革是一致的。早在19世纪中期,就有研究者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激进改革“所特别强调的目标,是要在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的心灵和生活中,实行和实现基督的教义和信仰。他们的目标是把所有真正的信徒从堕落的国家教会中带出来,进入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教会。他们所要完全地、直接地实现的目标,正是宗教改革最初所要实现的目标”<sup>[14]</sup>。

因此,从激进改革兴起的背景、早期领导人与宗教改革的关系及其根本目标来看,16世纪欧洲的激进改革是宗教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宗教改革方向上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宗教改革指出了变革的宗旨,提出了依靠《圣经》权威的主张,吹响了反对天主教会宗教和政治权威的号角,但是路德等人领导的主流改革局限在宗教范畴之内,止步在世俗权力面前,未能完全实现宗教改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激进改革运动的发展很快就与宗教改革的主流分道扬镳,驶向一条偏离主流改革的航道,并逐渐与主流改革相对立,成为被改革派建立的新教教会视为“异端”的敌对力量。从激进改革和宗教改革运动关系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可以认为,主流宗教改革未能继续贯彻它所倡导的建立真正的基督教会的原则,在改革取得初步成功后与现实妥协,使得改革止步不前,从而与要求彻底改革的激进改革运动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可以认为,激进改革运动的主张超出了当时条件所能许可的范围,对现存政治、社会秩序造成强烈冲击,从而引起社会骚乱,危及到宗教改革取得成功所需要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无论如何,相比主流改革来说,激进改革运动的目标、手段和时机都过于激进,难以被主流改革所接受,与之兼容共存。实际上,这也正是激进宗教改革之所以被冠之以“激进”之名的原因。



另一方面,可以认为激进改革包括两个层面:信仰层面和社会层面。在信仰层面,激进改革反对包括社会全体成员参加的全民教会,反对世俗权力控制和干涉关于人的信仰问题的宗教事务,主张仿效使徒时代的原始教会,建立与世俗社会 and 权力相分离的信徒教会。在社会层面,激进改革反对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压迫,对贫富不均、等级秩序分明的社会不满,要求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更符合基督教原则的理想社会。激进改革由于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要求,并进行了社会改革的实践,从而超出了欧洲宗教改革的范围,深刻地反映了它的阶级代表性。其实,从阶级性的角度来分析,或许应该把激进改革视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激进改革派要建立不受国家政权干涉的、由信徒自愿参加的、追随基督过圣洁生活的基督教教会。他们憧憬着并努力实现在地上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平等、更符合使徒教会原型的基督教教会。这本质上反映了下层民众对社会和信仰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也体现出他们自身所提出的利益和要求。

欧洲宗教改革开始后,很快就席卷社会各阶层,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大众加入到运动之中,宗教改革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在中世纪欧洲,教权与政权合一,宗教思想和社会思想密切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社会改革要求只能通过宗教改革表现出来。恩格斯说:“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sup>[15]</sup>因此,从本质上看,激进改革所代表的是农民、工匠等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这些下层民众要求摆脱政教合一的天主教政权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束缚,希望能够通过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在寻找一个没有政治因素的宗教信仰形式的同时,谋求建立一个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公正的理想社会。

16世纪欧洲的激进改革,无论是卡尔施塔特、闵采尔等教士从神学教义角度进行的改革宣传、德国农民战争发动的反抗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武装起义,还是明斯特再洗礼派暴力夺取政权后采取某些极端社会改革和胡特尔兄弟会所建立的实行财产共有、集体生活的摩拉维亚公社,又或是再洗礼派建立的与世俗社会和政权相分离的信徒教会,都突破了主流宗教改革的范畴,成为宗教改革的继承和继续发展。从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看,激进改革,无论是宗教改革还是社会改革,都是下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因为如恩格斯所说,这些斗争“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的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结论提出来的”<sup>[16]</sup>。

因此可以说,16世纪欧洲激进改革运动既是一场宗教运动,也是一场社会运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高度评价激进改革运动:“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

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sup>[17]</sup>这场运动力图通过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教会,表达下层民众对于一个更为公正、更为平等的理想社会的诉求,并努力将之付诸实践。无论是在基督教历史上还是在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上,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激进改革运动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 注释: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90页。

[2][4][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113、115页。

[3][5][6]林荣洪:《基督教神学发展史(三):改教运动前后》,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132—133、139、148页。

[7]Harry Loewen, *Luther and Radicals: Another Look at some Aspects of the Struggle between Luther and the Radical Reformers*,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1974, p.32.

[8]Tom Scott, *Thomas Müntzer: Th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 St.Martin's Press, 1989, p.34.

[9][10]Michael G. Baylor, ed. & trans., *The Radical Reform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0, 25—30.

[11]Hans-Jürgen Goertz, ed., *Profiles of Radical Reformers, Biographical Sketches from Thomas Müntzer to Paracelsus*, Herald Press, 1982, p.39.

[12][德]彼得·布瑞克:《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陈海珠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13]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1页。

[14]Harold S.Bender, “The Anabaptist Vision”, *The Mennonite Quarterly Review*, 1944, p.74.

[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236页。

[16]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3—404页。

[1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7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